

孙勐

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密码：盯得住，一盯到底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就在田野考古一线奋战了15个春秋。”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研究馆员孙勐说。孙勐出生在1979年，2002年大学毕业后，想一心从事考古工作，就选择了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

参加工作15年来，他一直在从事野外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建设（重庆涪陵）、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国家和北京等重大项目的考古工作，有效保护了国家文化遗产，擦亮了首都的金名片。

凭着对工作的执着，孙勐始终奋斗在田野考古第一线。考古工作有其特殊性，一旦开工，周末、节假日都不能停工，他和他的团队经常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坚守在考古工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考古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真实写照。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2016年以来，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的情况下，为做好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单位选派孙勐作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

神，通过查找、分析大量文献、档案，确定了路县故城城址的线索。

此后，他精心组织城址的考古勘探，冒着酷暑严寒，钻进庄稼地，扎在沟渠中，带领勘探工人，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内，对近80万平方米的区域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以城墙夯土为切入点，确定了城墙、城壕、主要道路以及该城址的基本范围、形制、结构、年代等基本情况，掌握了这一区域的地下文物埋藏状况。这是通州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也是通州建城之始。路县故城城址的及时发现，文物价值、历史内涵的准确判断，为未来城址的全面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城市副中心建设中文化传承、文脉延续做出了贡献。2017年4月，他主持的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荣获了“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7月至11月，为配合京唐铁路和城际铁路联络线建设，孙勐主持在路县故城城址外进行了考古发掘，完成面积16000平方米，发掘了汉代灰坑800余座、汉代房址27座、汉代至清代水井111口以及各个时期墓葬多座，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发掘成果与路



县故城城址作为县级治所的时代相吻合，与路县城址的历史和考古学文化联系非常密切，是两汉时期路县故城外的一处生活、生产区。

丰硕成绩的背后，是以孙勐为代表的考古人的默默付出。为了找到这座城，也为发掘、保护好这座城，孙勐吃住都在工地上，连周末都不回家。他所在的部门为了强迫他回家与家人团聚，专门把部门例会定在周五下午，方便他散会后回家看看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选择返回考古工地。

孙勐能够始终保持着对考古工作的热爱，在坚持野外考古的同时，还加班加点钻研考古科研工作，出版专著3部，合著6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成果丰硕，用实际行动阐释北京传统文化，服务社会。

在田野考古中，他非常注重考古勘探、发掘等实际操作的规范性、准确性，重视考古现场对遗迹、遗存性质、形制、年代、用途的综合判断与宏观把握。因为在圆明园考古工作的杰出表现，他参加的“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与含经堂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孙勐就要着手考古资料的整理、公布和出版，这是对田野工作的总结、深化与研究，也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深度阐释。孙勐的专著《南水北调北京段考古报告》《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获得学界的高度赞誉。

孙勐将考古视为毕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有着强烈而执着的热爱，他“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张中华

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副主任

苦读“板砖文献”练就博学考古人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密码：学会“穿越”，像前人那样思考

2015年6月15日，圆明园西洋楼遗址作为北京市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开始面向社会开放，由此，神秘的考古现场从银幕搬到了公众面前。张中华就是提出“公众考古”的那个人，让普通老百姓有了近距离观摩考古发掘的机会。7年专业学习考古，11个年头始终埋头在考古工地，主持过玉河遗址、圆明园9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刊发数十篇论文……已获得丰硕成绩的张中华，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开创了“公众考古”。

硕士学位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张中华，毕业后来到了北京踏上了他的考古之路。

尽管多年的考古工作，让张中华获得了很多成绩，但张中华却说自己越挖越不明白，越做越发虚。白天在工地，晚上回家写完发掘日志，必须得看看书睡觉才踏实，张中华说，担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的这几年，是他睡觉最少的几年，“我现在的工作就像一个艰辛的‘穿越’。”

上学的时候，张中华学的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新石器时代没有文字，学习的只是田野考古方法，而现在在圆明园做的是清代考古，一下“穿越”了几千年，而这个跨度对于

张中华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新石器时代不涉及古建，更不涉及园林艺术，这些知识点不懂的话，写出来的考古报告一定是贻笑大方。只有抽时间翻阅大量文献，恶补这方面的知识，遇到问题马上解决，不然越积越多。

主持过多个考古项目的张中华深知，一个考古工地的收获或者效果取决于考古工地负责人的素养和视角。一位考古学家的养成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考古学是非常综合性的学科，要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考古学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考古虽然分类在文科，但包含文科、理科、医学、工科、地质学科、体质人类学等等。“比如，挖出来人骨了，多大年龄的，生前是做体力劳动多还是脑力劳动多？是男是女，生前得了什么病，有没有龋齿？裹没裹过脚？这些认识，如果在现场注意不到，考古信息就会把握不准。再比如古动物学，挖出动物骨，你就会考虑到这具动物骨是否跟人类生活的环境有关，可以分析出，是通过打猎还是驯养的？还有植物学，你会从中了解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野生的还是培育的？历史学更不用说了……”这段话，张中华说得停不下来，而记者听得早已张大了嘴巴。



“可以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我们都要学一点、懂一点。”张中华说，考古学家是博学的一点不夸张，考古过程没有捷径可言。这些知识对当时刚刚接触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枯燥的，但真正到了发掘现场，就会发现需要了解的知识太多，这就有了为什么考古的人工作之余还会自觉跑到图书馆搬回大量板砖一样的文献苦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等，只要是存在的，对考古学都是有用的。“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把信息采集得更全；才能够把历史的废片，通过丰富的知识复原得更多，才能通过考古让人们了解到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走过来的，将来怎么发展。”

干了这么多年考古，张中华越来

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人低估了古人的智慧，古人的内心更单纯、更投入、更专注，那份工匠精神比现代人更强大！“圆明园的工艺，包括建造工艺、建筑质量很多现在都学不到，比如建筑中用到的‘三合土’，比我们现在用的水泥还耐用，三百多年依然如故，现在在实验室研究比例配方，成分的精确比列测不出来。再比如瓷器，尤其是粉彩，现在做的远没有当时烧的好，还有琉璃的烧造，我们在圆明园发现了七种琉璃，甚至在一种琉璃上面发现五种颜色，可想它的烧造经过了多么复杂的流程和工艺……”张中华的介绍又停不下来了。所以，他希望通过“公众考古”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这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文化的向往。